

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五分校——一所培养红军干部的熔炉

□ 黄 鹂

在江西省上饶市横峰县葛源镇，坐落着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五分校（简称红五分校）旧址。这所专门培养军事人才的学校由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创始人方志敏亲自创办，是我们党最早创办的军校之一。从1928年底创办至1934年10月办学结束，红五分校先后培养了1500多名优秀的红军指战员，为进一步壮大红军武装力量、巩固和扩大苏区作出了重要贡献。

红五分校因适应赣东北地区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需要而诞生。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建立初期，革命武装力量相对薄弱。方志敏在领导革命斗争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这一问题，当时有的红军部队“虽经过不少次数的战争，但作战经验究竟还幼稚得很”，而有的地方同志“连普通的革命常识都还没有学到”，要建设一支能征善战的红军，就必须培养具有较高政治和军事素养的红军领导人才。1928年底，方志敏创办了红军教导大队，这是红五分校办学的开端。随着闽浙赣苏区局势的逐渐稳定，1929年10月，信江特委决定以原红军教导大队和学生军为基础，建立信江军事政治学校，即红五分校的前身。

1930年3月，中共中央明确指示，“要在红军中成立红军军官学校，吸收斗争的兵士与工农分子加以军事政治训练，造成自己的军官”。4月，出台的《中共中央军委军事工作计划大纲》进一步提出对各地已开办的红军学校实行统一管理，扩大办学规模等要求。赣东北省委严格贯彻党中央决定，更加重视军队干部的培养工作。信江军事政治学校的学制设计、教学内容等方面都有了新的调整。1931年2月，为纪念被国民党杀害的彭湃和杨殷两位烈士，信江军事政治学校更名为彭杨军事政治学校。1933年初，根据中央统一编号，彭杨军事政治学校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学



红五分校校舍旧址

校第五分校。

受当时严峻的战争形势影响，红五分校在整个办学历程中多次迁转校址。红军教导大队创办于弋阳县大溪头村，信江军事政治学校曾在弋阳第九区吴家墩办学，后来正式更名为红五分校时，校址又迁至横峰县葛源镇杨氏宗祠。

在信江军事政治学校的开学典礼上，方志敏明确指出：“我们这所学校不是普通学校，它是一所种子学校，是一支学兵大队，是一所培养红军干部的熔炉”。“造成红军铁军骨干，争取革命战争胜利”成为红五分校的办学宗旨，当年这16个醒目的大字就写在红五分校大门两边的高墙上。方志敏、邵式平等先后担任红五分校政委，直接指导学员招收、教育管理、课程设置、作业安排等工作。在学员的选拔招录上，特别注重对政治素质和身体条件的考量，一般从红军和进步的苏区青年学生中筛选年龄

在会等组织。在教学课程设置上，特别强调军事和政治并重的原则。军事学习有军事课，由军事教员教军事知识，内容涉及步兵操典、战斗条令、野外勤务、进攻和防御等；军事操课则由讲堂延伸到操场，突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确保学员对军事技能的完全掌握。政治课学习的主要内容为《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原理》等。

在整个办学过程中，红五分校始终注重学用结合。为巩固和提升学习效果，要求学员在课堂上进行一段时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军事知识、战术案例学习之后，全部分配到连队，上火线经受实战锤炼。待学员把学到的理论知识经过战场上的实战检验后，再回到军校进行讨论总结。这种战训结合的教学模式深受学员好评，信江军事政治学校办学时期的首期学员、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中将军衔的吴克华将军在《培养红色指挥员》一文中写道，我们也深深地感到这种学习方法的好处。连队生活给了我们丰富的实际知识。特别是频繁的战斗生活，更给了我们以实际的锻炼和教

育。老红军、新四军老战士，学员黄元庆也回忆道：这些战斗和实际生活的锻炼，使我们把在课堂里和操场上学到的东西与活生生的实际结合起来了。

闽浙赣省委对红五分校的办学情况高度重视。《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关于军事工作的决议案》中指出：“对于干部的培养，必须加以极大的努力。红五分校应更加扩大与加强，要求有显著的成绩并努力编印各种军事训练的小册子，供给各部队的训练材料。”方志敏等人亲自为红五分校编写讲义课本，定期向学员讲授军事课、政治课和理论课，积极对全校师生开展革命思想、政治思想教育动员，致力于以学员政治能力的全面提升保障实战效能。

红五分校的学制大多为六个月，学员毕业后分配到红军连队任见习排长、见习连长或见习指导员，成绩优秀者破格提任营、团级干部。在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我军优秀指战员和高级将领饶守坤、方震、黄立贵、洪涛等都毕业于红五分校。

在近六年的办学时间里，红五分校为红十军和中央红军培养和输送了大量优秀的军事骨干，使红军力量得到了不断充实和发展，取得了诸如葛源之战、曹溪之战、贵溪之战、攻横峰战、河口之役等一系列重要战斗的胜利，多次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赣东北地区的“围剿”，为闽浙赣苏区筑起了一道坚实的军事屏障。从红五分校走出去的学员，在之后的革命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红色记忆



从小清河到游泳池

□ 北 村

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我知自己算不上知者仁者，不过，我既爱水，也爱山。从老家的村庄向西眺望，二三十里外就是巍巍太行，但直到上大学前也没爬过山。而滹沱河支流小清河（又叫清水河），就从我村边潺潺流过，因此，我从十岁起就有缘亲水。小清河那清澈的河水、嬉戏的游鳞、摇曳的水草、悠扬的蛙鸣，令人情不自禁地一跃而下，畅游其中。

记得刚上小学的时候，夏日的中午漫长又炎热，小伙伴们便相约午饭后去小清河要水。我们那里把游泳叫作要水或泅水，这样的叫法其实挺精准，因为我们就是在水中俯仰、嬉戏，并不追求游出多远，而我们的泳姿也只有一种——狗刨。我是在和小伙伴玩耍时玩到闹中学生会狗刨的，小脑袋瓜儿露出水面，双手在水下紧划拉，双腿则扑通扑通使劲划水，溅起一片白花花的水花。耀眼的阳光洒在河面，闪闪烁烁、明明灭灭，还把河水晒得暖烘烘的，让人在水中游起来那么惬意。我至今也想不通，为什么树荫下的水会更凉，因为河水是流动的呀，不应该因为流入树荫就变凉。可就是那么奇怪，一游到树荫下就有一种凉凉的感觉。要水最刺

激的场景，就是站在木桥当中，像跳水运动员那样跃入河中，那一刻真的非常爽！不过，如果跳水姿势错了，一不留神肚皮先砸在水面，那种生疼令人记忆犹新。后来，水性就练出来了，虽然不会什么蛙泳仰泳蝶泳，但是在水中俯仰自如。除了泅水、跳水，小伙伴们还经常打水仗，用掌根击水波向对方，边泅水边向前冲，很好玩儿。

乡下的孩子，大都是在河流、湖泊、水塘中学会游泳的，但河流、湖泊、水塘也夺走了很多少年的生命，几乎每年都听说远远近近有孩子溺亡，我的一位表哥就是少年时要水不慎淹死的。因此，老师、家长绝不允许孩子们私自下水。每到夏天，下午上学的时候，就经常有老师站在教室门口拦住一些平日里调皮捣蛋的男生，抓住他们的胳膊用指甲在上面轻轻划，如果划过后留下一道白印儿，那就意味着这名同学中午去要水了。那些倒霉的同学不仅会被老师严厉呵斥，而且还要被罚站，有时候还会通知他们的家长。我当年是个学习成绩好的乖孩子，老师从来也没拦过我划指印。如今，几十年过去，故乡的小清河早已干涸，再也不会有人畅游其间了，不知其他地方的孩子们是不是还会在河流、湖泊、

水塘里野泳？尽管我小时候玩得很尽兴，但现在想来游野泳真的很危险，孩子们游泳还是要请正规教练指导、在游泳馆里游比较好。

自从读高中离开故乡，大约30年没有再游泳。2007年，我和同事在石家庄全民健身中心游泳馆办了游泳卡。头一回到游泳池游泳，看人家无论蛙泳、仰泳还是蝶泳，泳姿都很规范，相比之下，我的狗刨就太难看了，不禁自惭形秽。于是，我便跟同事学蛙泳。由于水性还不错，很快就学会了。后来由于工作太忙，又一次中断了游泳。2011年5月，我因颈椎病住院，出院时主治大夫建议我坚持蛙泳，防止颈椎病复发。刚好我们党校游泳馆建成投用，我便在出院后恢复游泳。果然刚游泳锻炼了几个月，不仅颈椎病没有再犯，而且体检各项指标都开始好起来。尝到游泳的甜头之后，我坚持每天中午都去游泳馆游一两千米，最多的一次一口气游了5千米。此后，除了疫情期间不得不中断外，只要有条件，我便坚持游泳。现在每天游2千米，用时约65分钟。大致算来，几年中游了2200多千米，相当于从北京游到了广州。游泳是一项全身性运动，不会对腰椎及膝关节造成压力，能锻炼下肢肌肉，增

加腰椎、四肢的协调性。经过游泳健身，我的血糖降至正常值，脉率也更稳定，过去多年伏案工作的腰部不适也改善了，锻炼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回眸断断续续几十年的游泳往事，曾作一首《七绝·游泳》抒发感慨之情：“魂牵梦萦小清河，浪水扬波野趣多。矫若游龙今又是，清池莹澈舞婆娑。”游泳不光让人身心愉悦，还能磨炼人的毅力。与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等球类运动相比，游泳是一项很孤寂的运动。长跑还可以戴上耳机听着音乐有节律地运动，游泳只能在水中单调地挥臂蹬腿，未免枯燥乏味。特别是进入天寒地冻的时节，大多数人都都不肯再去游泳，有时候偌大的泳池只有一两个人。这时候再坚持游泳，对意志无疑是一种磨炼。我想，当一个人练出了坚韧的毅力，他在任何艰难困苦面前都不会犹豫退缩，这或许是长期坚持游泳的意外收获吧。



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文献中心，典藏着一册珍贵的话剧剧本《前线》。这部剧本是苏联剧作家柯涅楚克（时译科尔内楚克）在1942年9月创作的。传入延安后，成为整风运动的生动教材，在促进党内思想统一和作风转变方面影响深远。

《前线》以苏德战争为背景，讲述了苏联军队某前线总指挥部发生的故事，展现了当时苏军军官中新旧观念的激烈冲突。总指挥戈尔洛夫夫是一名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他有功劳、忠诚勇敢，但同时也自尊自大、因循守旧，不愿学习现代化军事技术，难以经受新的战争形势考验。而年轻的军长欧格涅夫则善于学习新技术，能够运用科学的方法部署指挥战斗，带领军队赢得胜利。最终，戈尔洛夫夫被撤换，欧格涅夫被任命为新的前线总指挥。除了戈尔洛夫夫，作者还以辛辣讽刺的笔触塑造了另一个经典人物客里空。作为一名战地记者，客里空不愿到一线了解情况，仅靠坐在指挥部捕风捉影甚至编造事实写新闻。他甚至说，“假如我只写我所看见的，那我就不能每天写文章了。我就一辈子也休想这样出名了”。寥寥数语，一个夸夸其谈、沽名钓誉的形象跃然纸上。

《前线》发表时，苏联正处在战争紧要关头。这样一部尖锐的自我批评的文艺作品一经面世，就在苏联社会引发了强烈反响，苏联三大报纸《真理报》《消息报》《少共真理报》在同一天刊登评论文章，阐释这部剧本的重要意义。文章提到，该剧本的力量“是在于艺术形象的真实和生动，在于勇敢和正确的描写”，在于它提出了“关于红军的成功和失败的问题”。同时，这部剧本“号召同骄傲、自鸣得意的胜利、夸耀和阿谀作不调和的斗争”，正是对这些不良风气的批判才使得苏联红军变得更加坚强和富有战斗力。

1944年，萧三将该剧本译成中文，并送毛泽东阅读。毛泽东非常重视剧中人物形象的借鉴意义，把剧本推荐给《解放日报》发表。《解放日报》专门发表社论《我们从科尔内楚克的〈前线〉里可以学到些什么》，肯定这部剧本“价值无可比拟”。社论将这部作品蕴含的观点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赋予其新的内涵。社论指出，“我们所处的环境，是长期农村分割的游击战争环境，在这种客观环境中，容易产生戈尔洛夫夫这样的人。但只要有了主观上的警惕，主观上的努力，我们是可以减少这种现象到最低限度的。”由此可见，《前线》对于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价值在于它警醒广大领导干部始终保持自省，勇于直面问题和接受批评，培养实事求是作风，不断学习新鲜事物，从而紧紧跟上“急速奔流的时代”。

不久，中宣部和总政部联合发出《关于〈甲申三百年祭〉〈前线〉的通知》，鲜明指出《前线》同《甲申三百年祭》一样都是“反对骄傲的”，要求各地在收到新华社全文广播后将两书翻印，在干部中散发并展开讨论，如有条件还可上演该剧。接到通知后，各根据地和解放区纷纷响应，结合整风运动组织党员干部开展学习。比如，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就将《前线》列为整风学习文件，号召县团级以上干部结合自身实际问题加以讨论。

为配合学习活动的开展，各种中译本也陆续编印出来。从版本来看，目前常见的有胶东新华书店1945年版、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1946年版、新知书店1948年版和华东新华书店总店1948年版等。从译者来看，除萧三外，刘辽逸（化名聊伊）也曾翻译过该剧本。校（院）图书和文化馆现藏版本为华东新华书店总店1948年11月第3版。该版剧本由萧三翻译，与《解放日报》刊载时的人名译法相同，作者名译作科尔内楚克。文献封面为战斗剪影图，题名页钤有“马列学院图书馆”藏书章。正文部分收录《解放日报》社论、苏联报纸评论文章、作者和登场人物简介及剧本全文。

各根据地和解放区还积极组织排演活动，仅在延安就有两台《前线》话剧上演。一台是由枣园业余组织首演的《前线》，人们将其称为“枣园家的《前线》”。这出剧目在延安引起不小的轰动。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彭真深有感触。他

《前线》：一本『反对骄傲』的教科书

□ 程清觀

说，这部话剧对中央党校来说更加重要，因为中央党校集中了党内各个历史时期的干部，各方面军的干部，各根据地和白区的干部，还集中了除在延安工作以外的全部“七大”代表。六大干部三千多学员，加上公务人员六千多人，大多看了两次《前线》。大家边学社论、边思考、边讨论，学习氛围非常热烈。党校的学员纷纷表示，戈尔洛夫夫思想会导致经验主义错误，对党和革命事业、对自己个人的进步，都会带来极大危害，这种教育是一生都不该忘记的。

1944年秋，彭真提出要集中延安的优秀戏剧人才排演该剧，向党的七大献礼。这便是另一台由中央党校与鲁艺联合演出的《前线》，人们称其为“联合剧团的《前线》”。彭真要求排出一台高质量的戏，要强的导演、强的演员阵容、强的舞台设计，排练要精雕细刻，表演要严肃认真，使人看了以后，不仅在思想上受到教育，还能在艺术上得到美的享受。据曾参与该剧舞台设计的工作人员回忆，当时全体人员集中在中央党校进行排练及筹演工作，得到了各方面的热情帮助。比如，大家在设计第二幕第四场“路旁的战壕”布景时，不知如何布置景物和调度点位，于是去请教一位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高级军事干部，结果得到他的热情帮助和指点。这名学员还亲自动手，在地上挖出示范的沙盘模型，给剧组人员很大启发。经过精心打磨，1944年11月15日中央党校和鲁艺进行了联合演出。在党的七大期间，剧团还曾为代表们进行专场演出，博得一致好评。

随着剧本的传播和剧目的上演，剧中的戈尔洛夫夫、客里空，成为思想僵化和哗众取宠、编造假新闻的代名词。当时各级干部都以这两个典型人物为镜子，对照检查自己的作风，这出剧目实实在在成为引导广大干部克服不切实际、骄傲自满情绪的生动教科书。

